

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是： 过滤和拒绝信息的能力



10月27日下午,阿来在九所宾馆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。 记者 范远志 摄

面对高原、雪山、草地,我觉得安全,没有任何危险

都市周末:你经常独自驱车前往青藏高原,扎帐篷,在天地间享受巨大的孤独。我想这不是那种小资情调的诗意,而是更原生态的一种诗意。为什么选择独自一人?这也算是你践行自己想做“地质学家”理想的一种方式么?

阿来:现在的城市生活空间很小,和你在一起的很多人其实都是陌生人,和你有关系的人只是极少数。我们处在一种嘈杂、纷乱甚至是不安全的环境里,因为太多的陌生人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会经常带上帐篷到海拔高的地方去呆着,面对的就是高原、雪山、草地,还有各种植物。这时候我才会觉得安全,不用担心什么,没有任何危险。

都市周末:没有遇到过自然危险么?比如野兽、恶劣的天气。走了这么多地方,你觉得最漂亮的是哪里?即兴野搜中可有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感动的经历?

阿来:我们对生态破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,已经没有什么几率能让你遇上那种会伤害人的猛兽了吧!至于天气状况,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都会有一些基本的常识,比如不能在太陡的陡坡下扎帐篷,怕泥石流或者小动物从坡上滚石头下来。这些问题不大。

从露营来讲,我最喜欢的还是青藏高原。印象最深刻似乎没有。我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在野外度过,已经习惯了。有时候睡在帐篷里,外面大雨,感觉整个世界都落在周围,早上雨停,拉开帐篷探出头,满天都是星斗,睡袋前每一棵花草上都是露珠,空气都是沁甜的。我不太喜欢去那些人文古迹,就喜欢去野外,庙宇啊教堂啊什么的我也会去看看,但看多了都一样。只有大自然是丰富无穷的。去年去瑞士,今年去英国,别人都在城市里逛,我都要抽一定的时间独自到野外去。

植物识别是种有趣的智力游戏,我想把它和它的环境都表现出来

都市周末:大自然在你的作品中始终占领着重要的地位,你在旅行中也喜欢拍摄花朵和植物,为什么钟爱给小花们拍大特写?

阿来:为了呈现它呀!我不仅仅会给植物拍特写,还会拍它的大环境。特写是展示整个植株的形态,还有一些照片是要把它和环境的关系交代出来。因为很少有植物能够单独生长,他们总是靠在一起,互为环境。它和谁互为环境,它的生境如何,需要去表现出来。

植物识别是种有趣的智力游戏。植物分很多科、属,同一科的植物很相近,甚至只在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产生差别,有的只是花缺的方位不一样,有的是雄蕊的个数不一样,你必须一一细数,去观察、辨别。比如桃花、杏花、梅花、李花、梨花、樱花比较像,因为它们都是蔷薇科李属的,都是五瓣,但杏花有浅红色的花萼,从远看花朵带点红;梨花很白,雄蕊在刚开花时是红的……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区别的特征。

都市周末:很多专业人员其实对植物都不像你这么了解,比如长沙现在一些给植物挂牌的技术员,可能会挂错。大家对植物了解太少了!

阿来:现在有一种学科叫分子生物学,你送一滴血

去,他可以通过研究知道这滴血是不是你的,但你真的站在他面前,他可能不认识你。这跟研究植物是一个道理。当然还有一点,中国人好像都不太热爱自己的职业,能混过去就行,对自己没有更高的要求,就像不是每个记者都是好记者,也不是每个园艺工都是好园艺工。

都市周末:他们做的其实更加类似于解剖学的东西,没有注入太多情感和温度的交流。

阿来: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讲的,尤其是文学。我常打个比方,一个人站在你面前,你老去分析它,这个是手,这个是脚,而忽略了把它们合拢的、跟我们发生情感的生命,就是古人说的“气”或者“场”。

都市周末:这是否也是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很难传承的一个原因?

阿来:对呀!就像中医,对采药的时间、地域、方式,包括对中草药的抽象的认识,对这些生命的理解,都是有很高要求的。正因为有太多要求,传承变得很难。

为了呼吁人们保护自然,他们“挟”罗斯福总统去森林里露营

都市周末:你和那么多花朵交流过,有自己最喜欢的吗?

阿来:没有。只要你仔细观察,会发现每一个花朵,都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特别精巧的一种设计。但我会特别被一种美震撼,不是对于花的品种,而是在某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地方它那么顽强地绽放。比如前两天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,在很深很深的雪里发现一个小窟窿,再仔细一看,居然还有一朵花没来得及凋谢,就那样冻僵在那里。哎哟当时我那个震撼啊!

再比如一些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,百草不生,但有些植物竟然连叶子都来不及长,就那么温暖的几天,赶紧绽放。说到植物开花,其实就是花朵把生殖器官露出来,展示它的性嘛。当我们把一些色情文学写到那么不堪的时候,再看植物,会发现原来性是那么美好、对生命是那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那些高原上的花朵,在那样的高度,给它的时间可能就是那么几天、十几天,它必须赶紧绽放,非常迅速地把它的生命传达出来,繁殖下去,甚至连叶子都来不及长,或者叶子很小,花朵很大很大。

都市周末:古典文学里关于植物的描写很多,现代人对植物的描写很苍白,即使有,也是符号化的。你有一本书叫《草木的理想国:成都物候记》,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系列专题报道《湖湘植物志》。除了成群结队出去旅游、破坏生态,现代人对自然地理的真正学习和梳理太少了。

阿来:我们经常写错植物,知道的那一点点都是在中国文学中高度符号化和象征性的植物。古人描写自然对象的时候都是有具体名字的,今人笔下的自然都是虚的,都是些不知名的小鸟和花朵。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比较小资的写作,更多只

是觉得一些植物的名字洋气好听,比如勿忘我、薰衣草,你只要稍微较真一下,就发现,他写到的某种植物跟他描写的地域和季节都不对,他只是抄了一些花草名字放到他的文字里。

100多年前,美国工业化开始,对河流的污染、森林的砍伐也非常严重,当时突然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家,比如梭罗、利奥波德等。他们还把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罗斯福请去森林里露营,早上听鸟叫、看日出,晚上躺在森林里看月亮怎么升起。他们觉得,如果不能保护整个美国的话,至少可以先保护美国的一部分。这也是最早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概念。他们通过说服很多人,包括把总统弄去露营,促进美国在100多年前就建成了国家公园。而中国关于“自然保护区”的概念很晚才有。

梭罗更多地是做一种实验,《瓦尔登湖》就是把这种简单生活的实验记录下来。他还写过其他的东西,比如《种子的欲望》、《野果》,他仔细观察某一个地区种子怎么传播、发芽、结果。这些自然主义文学家做了好多亲近自然的事情,写过很多关于自然的书,如《夏日走过乡间》、《沙乡年鉴》等。利奥波德在半沙漠化的地方买一小块农场,观察在这样的地方生态怎么恢复。就是这些自然文学家,呼吁人们保护大自然,成为我们今天的环保主义的祖宗。

西藏在大多数人心里是个形容词,对于我来说只是名词

都市周末:在一个网络、声像遍布的虚拟时代,用实勘大地的方式具体地面对生活的局部,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?

阿来:我们现在把技术力量对人的支配看得太重。网络无非是加强了即时通讯能力,但我一直有一个警惕:绝大部分的即时通讯是没有必要的。你没有必要知道你微博里那些人早餐在吃什么?这些信息没有任何用处。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是:过滤和拒绝信息的能力。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网上获得的信息跟我们的个人生命没有关系,跟我们良好的情感状态没有关系。我虽然不反对艳遇,但你说如果每次我走到机场都想要用什么微信摇个什么艳遇出来,那也太麻烦了。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处理那些没有用的信息上。我不拒绝网络,但我跟网络是保持距离的,比如平时除了一些特别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,每天台式机上网也不超过半个小时,手机也取消了网络,包括微博客户端那些都取消了。因为我发现它们会捆绑你,把你的生活切得七零八碎。我们不要被它控制。

这不仅对我的创作有帮助,更对我的生命有帮助。因为写作也是丰富我生命的一种方式。

都市周末:现在很多汉语作家,包括西藏本土作家,在描写西藏的时候都有所修饰,他们笔下的西藏生活并不是藏族真正的原生态生活,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
阿来:在所有人的认知当中,已经把西藏高度符号化了,对于他们来说,西藏是个形容词。它担负的是我们生活的反面:如果我们城市,它就是乡野;如果我们文明,它就是野蛮;如果我们的城市生活意味着束缚,它就是放纵。但对于我来说,西藏是一个名词。我就在那个名词里生活,看到它的方方面面,有美好的一面,也有很不美好的一面,跟任何地方一样。在中国今天的写作,尤其是带点小资情调的写作中,它正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,而且这种符号化不是没去过西藏的人这样写,就连去过西藏的人也这样写。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今天的旅行方式造成的,我们只是看看风景,并没有真实地深入当地人的生活,我们带着某种想法去了,只看到符合我们想法的东西。所以,不是人们想的那样,这儿缺什么,那里就有什么;相反,这儿有的,那里都没有。

■文/记者 李婷婷